



燕山史志丛书

中国城市志
编纂的若干问题

陆天虹著

北京社会函授大学教材

中国城市志编纂的若干问题

陈天虹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北京社会道授大学教材
中程城市志编纂的若干问题

陆天虹 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36号
北京市社科院印刷厂印刷
北京市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 8 25 字数：210千字

1988年12月北京第1版 1988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ISBN7-5402-0128-2/2·0011

印数：1—4000册 定价：2.95元

《燕山史志丛书》缘起

曹子西

中国是一个文化悠久的大国，有长期编修地方志的历史传统。自秦汉以来，历代都曾编有地方志书和专业志书，其中保存了大量关于各地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以及自然环境变迁的资料，成为后人研究、借鉴和运用的宝贵文化遗产。新中国建立后，成立了全国地方志小组，并在50年代末开展过一些修志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修志工作中断，直到粉碎“四人帮”、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新编地方志工作才得到恢复和发展。

在80年代，新编地方志作为一项重要的文化建设事业，引起各级地方政府的重视，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展开和改革开放形势的要求，随着县情、市情、省情、国情调查研究、系统周密了解的需要，这项工作进一步发展和兴旺起来。各级地方修志机构逐步建立与健全，修志专业人员队伍日益壮大和充实，并已陆续出版了数十种新编县志、市志和专志。

正是适应盛世修志新局面的出现，在中国地方志协会领导同志的关怀和支持下，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主办的北京社会函授大学于1987年增设了中国方志学系，第一届在籍学员即达三千来人。这些学员绝大多数来自编修新方志的第一线，还有一部分是县志、市志的编纂机构负责人。他们的文化程度较高、具有相当的写作能力，迫切需要学习、掌握编修地方志的基本理论和专业知

识。

北京社会函授大学为提高教学质量，组织好函授自学和辅导，聘请方志学教授、专家、学者撰写了一套适用于本专业大专水平的中国方志学函授教材。包括地方志重要文献选辑、地方志基本理论、中国方志发展史、县志市志专志编纂问题论集，以及地方志资料收集整理工作等等。北京燕山出版社热心于新方志的编修工作，现将这套教材中的部分撰著作为《燕山史志丛书》出版。今后仍拟随着新编地方志工作的发展，选收有关方志理论研究和新志稿总结评述等方面的论著。

1988年10月于北京

说 明

本书作者陆天虹同志是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成员、城市志指导组组长、武汉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本书所收报告、文章系作者从1981年以来参与新方志编纂工作总结研究的成果。作者从编修新方志实际工作需要和提出的间题出发，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对如何运用新观点、新方法、新材料和新体例编纂地方志，特别是城市志作了较系统的研究，对我们学习编纂新方志的理论和实践有重要参考价值，特作为《燕山史志丛书》予以出版，以飨读者。

《燕山史志丛书》编辑部

1988年4月

《燕山史志丛书》

主 编：曹子西

副主编：赵庚奇 王灿炽

顾问：傅振伦

目 录

群策群力，编好地方志

- 在《武汉通志》第一次编纂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1)

编纂新方志，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 在武汉地方志第二次编纂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18)

借鉴历史，编写新志

- 《武汉春秋》试刊词 (30)

在党的十二大精神指引下，努力开创修志工作的新局面

- 在武汉地方志第三次编纂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35)

统一认识，发展新体例

- 在武汉地方志第三次编纂工作会议上的总结报告 (54)

编纂社会主义地方志，要加强思想性和科学性 (69)

编纂地方志的组织领导问题

- 在《长江志》编纂委员会成立大会上的报告 (84)

对主笔的希望和要求

- 在《武汉市志》主笔研究班上的讲话 (96)

在十城市志稿评议会上的讲话 (101)

经济体制改革与城市志的编纂工作

- 在全国城市志编写工作座谈会上的专题报告 (103)

新方志编纂之“六要”

——在湖北省地方志工作会议上的发言（摘要）……………（119）

地方志怎样记述建国后的历史

——在《武汉市志》第二次主笔研究班上的总结讲话……………（134）

加强对城市志编纂业务的研究，适应新形势的需要

——在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城市志指导组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150）

谈谈总纂阶段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

——在武汉地方志学术年会和主笔研究会上的报告

……………（162）

充分反映改革，为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编纂城市志需要研究的几个问题……………（181）

发展大好形势，争取多出成果

——在全国城市志编纂工作研讨会上的总结报告……………（205）

分级总纂，保证成志

——在武汉地方志第五次编纂工作会议上的总结讲话

……………（223）

精心总纂，保证质量

——在《武汉市志》总纂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228）

努力提高地方志编纂的科学性

——在全国城市志篇目研讨会上的讲话……………（238）

群策群力，编好地方志

——在《武汉通志》第一次编纂工作会议上的报告

(1981年1月20日)

编修地方志是解放以来第一次，是我们武汉市的一件大事。历代叫做“盛世修志”，封建统治者认为，国泰民安了，才修地方志，是一个地方的盛事。我们现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经过这几年的努力，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政治形势、经济形势都很好，在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下，提出编修地方志的任务，这确是一件盛事，是值得庆贺的。这件事情，我们老一辈的革命家在解放以后很早就提出来了，很重视。解放以后，周总理就曾经指出：“我国是一个文化悠久的大国，各县都有县志，县志中就保存不少关于各地经济建设的各种资料，可是查找起来就非常困难，所以，我们除了编印全国所藏的方志目录外，还要系统地整理县志中及其他有关科学技术资料，做到‘古为今用’。”这是指要有计划地利用传统的地方志。董必武同志生前每次到湖北来都指示要修好地方志，他也是很重视修志这项工作的。

在1957年中央搞科学十二年规划时，其中有一个项目就是编地方志。1959年国庆十周年的时候，中央就指示各地要编写十周年的地方史，有些省、市，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这个工作也没有做完。在我们武汉呢，这件事始终没有引起大家的重视，所以就一直没有做。这项工作我们已经耽误了二十年。

我们许多长期在武汉工作的同志，确实感到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

去年上半年，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和市政府的领导同志提出，武汉解放三十年，还没有编出一部武汉地方志来，是一遗憾的事情。经过市委研究决定，设一个《武汉通志》编纂委员会，开展修志工作。并决定由武汉市委书记、代市长黎智同志担任编纂委员会主任，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的一部分负责同志担任副主任，武汉市的各部委办，工、农、青、妇、科，政协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担任委员，还聘请了一些长期在武汉工作的老同志担任委员，一起来编志。这些同志都是热心赞助并积极参加编志工作的。下面设立一个编纂办公室，有编制有经费，开始筹备工作。这个工作开始以后，就得到一些老同志的支持，都很关心，都很愿意积极地参加这一工作。所以在去年12月13日，经过几个月的筹备，就召开了第一次编纂委员会。会议对工作方案、工作条例和《武汉志》的篇目、体例、编纂的方法，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并初步确定下来。会后，担任编纂各个分志的有关的领导同志都很积极开展活动，形势是很好的。我们各部委办的一些负责同志，和各局的负责同志亲自参加各分志的编纂委员会，或者是领导小组，一起研究怎样开展工作，并且提供条件，抽调干部，说明我们的工作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开头。

去年，在天津举行了十三个省市参加的地方史志研究会筹备座谈会，交流了十三个省市编纂地方志和地方史的经验，在这个会上，我们也介绍了我们的作法与打算，我们的路子得到与会同志的肯定。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学习了各地的宝贵经验。

现在，湖北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也已经正式成立了，郭宁夫省长担任主任，也成立了一个编纂办公室。所以天津会议后，这一工作在全国各省市，都陆续的开展起来了。都认为是一种应该引起大家重视的、非常迫切的任务，一定要下决心把这件工作做

好。

编纂地方志，对我们来讲，是一项新的工作，从来没有做过，缺乏知识和经验，我们主要是向专家学习。因为研究近代史、现代史和党史的专家、教授，他们积累了这方面的不少资料，进行了研究，是有成果的，应该向他们学习。我们的筹备工作，第一步就是向专家请教，同时也向各个兄弟省市请教，向旧志请教，结合武汉的实际，搞了一个体例和篇目的初步方案。这个方案符不符合实际，是不是具有它的科学性，还有待于参加会议的同志大家来讨论。所以，这件事虽然是个开头，但是个很好的开头，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和支持，我们感到这件事是大有希望的。

编修地方志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传统，从秦汉以来到现在已经有二千年的历史了。历代各地都编有地方志，县有县志，州有州志，府有府志，省有省志，据统计，现在全国各地图书馆收藏的各种方志就有八千多种。中国的地方志也引起了外国的重视。中国现在收藏八千多种，世界各国收藏中国的方志也是很多的，尤其是在美国、日本、欧洲的一些国家。因为中国的地方志，记载各个地方的史料非常丰富、非常完整。过去历代封建王朝要推行有效的统治，他也要了解、考察地方的风俗、民情，他有这个需要。所以明清两代的皇帝都很重视地方志。有的皇帝下命令规定各地隔若干年必须修一次。时间长了以后，修地方志就成了一门专门学问，形成了一门方志学，也涌现了一批编修方志的专家和研究方志学的专家。这样，历代就把这个优秀文化传统继承下来了，保存下来了。地方志书中间保存了许多丰富的、宝贵的资料。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侵略，为了掠夺中国地方资源的需要，他们也大量的收集、窃取我们的地方志，收集情报。据说，沙皇俄国在两百年前就通过商人、传教士，窃取中国各地的地方志，窃取情报。一百五十多年前，日本人就到中国收购地

方志，抗日战争时期又在各地掠夺我们的地方志，据统计，现在散失在日本各地图书馆的地方志不下四千部。英美在鸦片战争中也掠夺了我们不少的地方志。据统计，光是美国的国会图书馆就收藏了中国的地方志三千三百多种。欧洲的七个国家也收藏了中国的地方志三千五百多部。所以，大量的中国的志书散失到世界各国。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的地方志详细地记载了各地自然、人文、物产等丰富的历史资料，他们收罗这些资料的目的是很明显的。当然也有一些学者是从研究中国历史的需要出发而收罗的。如英国的李约瑟博士以毕生精力研究、著作的多卷本《中国科技史》，就大多查阅了中国各地的地方志。他认为地方志的历史传统，其他国家是没有的。对比之下，我们自己因为各种原因，反而是落后了。中国地方志的历史是那样的悠久，积累的资料又是那样的丰富，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但是，从辛亥革命的六、七十年来，我们的这个优秀传统基本上是中断了。但是我们的这一优秀传统，有些国家却接受过去了，比如日本，仿造中国编修地方志是很普遍的。它的都、道、府、县，几乎普遍都修有志。就是相当于我们的街的町，也都修有町志，大一点的企业都有企业发展史。在去年中国史学会的会议上，胡乔木同志就曾说：“至于说到历史学本身的继承问题，我们所遇到的问题也很多，地方志的编纂也是迫切需要的工作。现在这方面的工作处于停顿状态，我们要大声疾呼，予以提倡。要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和体例、新的材料继续编写地方志，不要让将来的历史学家责备我们这一代的历史学家，说我们把中国历史学这样一个好传统割断了。”

编纂一部具有社会主义时代特色的地方志，这就是我们要担负的历史的责任。如果我们不把这项工作做好，将来下一代的人要问我们，你们在武汉工作那么多年，武汉人民委托你们为武汉人民办事，工作了几十年，为什么你们不能修出一部新的地方志来？我们将何以答对？所以我们人大常委会主任刘惠农同志说：

“我在武汉市当过二十年市长了，我们一定要修出一部武汉市的地方志来才对得起我们的后代！”过去旧社会的长官上任，当地的士绅首先送给他一部地方志书，入境问俗嘛，他也是搞调查研究嘛。毛主席早就告诉我们，对于省内外、县内外的历史和现状都要进行系统的周密的调查研究，从孔夫子到孙中山都要进行历史的总结。周总理、董老都一再提出来要修地方志。我们过去没有抓这个工作，这不能不是一件遗憾的事情，我们现在就要担负起这个责任来，不要让后代责备我们把中国的这个传统中断了。我们访问了曾经在武汉工作过的几位书记，大家都感到这件事是很有意义的，都表示积极支持。还有过去历史上曾经在武汉工作过的一些老同志，大革命时期、抗战时期在武汉工作的同志都非常关心。所以现在做这个工作，感到非常迫切。我们原来有许多知道武汉历史情况的老同志，由于自然规律，老成凋谢了。如果二十年前我们做这个工作，不少同志都在，收集材料就方便得多。现在就存在一个抢救史料的问题，再过若干年，搜集活材料的工作就更困难了。要抢救史料，无论是哪一条战线，哪个企业单位，都有这个问题，就是解放后新建的企业，也有这个问题。比如说，震惊中外的“二七”大罢工发生在武汉。记得刚解放后的第一个“二七”纪念日，市总工会组织“二七”老工人到施洋烈士墓去扫墓，参加的“二七”老工人还有好几十人，都还能徒步从汉口过江（因为那时没有大桥）走到共山去祭扫烈士墓，徒步走回，当时这几十位老工人身体都很好，现在恐怕是寥寥无几了。你要他回忆，记忆力恐怕也不行了，所以抢救活史料是非常迫切的。不光是回忆的问题，还要向他们请教，考证一些史实，在地方志上记载下来的史料，需要多方面的调查核实，所以要趁一些老同志还在的时候抢救史料、订正史料。

另外，从文字资料来讲，经过十年浩劫，很多资料散失了，查找起来已经是很困难了。再不加以收集、整理、利用，时间长

了这些资料就更乱了。十年浩劫中丢失的很多，销毁的也不少。由于没有重视，有的史料已经不知下落。这个方面武汉地方有它的特殊性。我们听了北京、天津、上海的情况，我们武汉市有它更加困难的地方。因为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的建制是没有变动的，武汉三镇，过去的建制和隶属关系是不同的，历史上的资料积累，比如湖北省省会在武昌，档案在省里，汉阳是汉阳县，汉口是特别市，建制不同，隶属关系也经过一些变化，一些档案资料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情况是比较复杂的。比如研究海关资料，对于研究进出口贸易，研究地方经济情况，是很重要的历史资料，而我们江汉关的资料在什么地方，下落就不太清楚，而上海是保存很完整的。我们许多方面的资料散失不集中，这方面的困难很多，如果不抢救，也要成为历史的遗憾。

以上我讲的第一个问题是介绍我们发起编纂地方志的缘起和编修地方志的迫切性。

第二个问题讲一讲编纂地方志有什么现实意义。

有的同志问，现在工作都很忙，为什么要花这样多的时间，这样大的精力来编写地方志呢？我们编纂委员会开会的时候，有的老同志说，这件事情办好了，它的意义不下于给后代留下一座江汉桥，或者是一座长江大桥。这是一个百年大计，是继往开来百年大计，有它的历史意义，是在精神文明方面的一项基本建设性的工作。

关于它的现实意义，我认为主要从四个方面看：

第一，就是系统地积累资料，为四化建设服务。资料工作本身就是一门科学，系统地挖掘、收集、整理武汉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城市建设以及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妇女运动、农民运动、科学技术工作等各个方面的历史资料，加以系统的整理、积累，它本身就是一门科学，是精神文明的一项基本建设工作。现在我们党的三中全会提出党在现阶段的总任务是：团结

全国各族人民，同心同德，有计划、按比例、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现代化高度民主的、高度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科学地、系统地搜集、整理、积累资料，编写新的地方志，这本身就是建设高度文明的任务之一。市委、市政府、市人大的领导同志在谈到修地方志的时候，就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搞四化建设，提出一项重大决策的时候，过去不少是从想当然出发，从主观愿望出发，缺乏科学的根据，缺乏数据。不是说一切工作都应从实际出发吗？实际是什么呢？常常是又清楚又不太清楚。系统的资料就是实际情况的科学记载，所以说资料建设是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根据。许多国家的资料工作已实现了现代化，无论是科学情报、资料、档案、图书等，一个城市、一个国家，甚至几个国家，形成一个网络，查找起来十分方便，资料的积累和贮存都十分完整，为科学研究，为生产建设，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工作提供了非常方便的条件。陈云同志说，我们是十亿人口、八亿农民的国家，我们是在这样一个国家中进行建设。又说，现在真正清醒认识到这一点的人还不很多。这里提出了一个搞现代化建设必须清醒地认识国情的问题。一个省一个市也是这样，要全面地清醒地认识省情和市情。我们搞现代化建设没有历史的和现实的资料怎么决策，怎么规划，根据什么？我们资料档案也有，并不是没有，但是零星的，片断的，缺乏系统性、准确性，缺乏科学性。有的领导机关就是这样，领导需要什么东西临时搞点资料，一拼凑，文件就出来了，根据这个材料下决心、作指示、作决定，就有一定的危险性。地方志就有这个特点，它积累的资料是比较全面、系统的，加以整理的，因此具有一定的科学性。旧的地方志，它对这一个地区的建置、沿革、山川、关隘、古迹、寺观、物产、田赋、灾异、风俗、职官、人物、艺文、学校、兵备、堤防等等，自然的、社会的资料都有记载。各县的地方志还有一个特点，都是当地人修当地志，近代人修近代志，不

但有第一手的资料，而且还可以实地考察、访问、采访、测绘，不但利用旧志，还要实地调查，用我们现在的活端是调查研究，所以它具有可靠性，它是当地的东西。这样的资料积累，成为一个地方史料的总汇。将来我们修的武汉地方志，将成为武汉地方资料的总汇，武汉各行各业的资料在这里都可以找到。也可以说是武汉地方的一部百科全书。它的用处就很大。

第二，是反映规律，总结经验，继往开来，推陈出新，为各行各业总结各自的历史经验，更好地为现代化建设服务。

我们的工作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这就要加以历史的回顾，探索客观规律，总结经验教训。比如说从1949年到1957年，经过了三年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可以说是我们三十年建设的黄金时代，是最成功的时代。第一个五年计划我们的工业平均增长的速度是百分之十四点六，职工的工资提高了百分之三十左右，消灭了失业，治安的情况最好，可以说做到夜不闭户，物资丰富，基本没有什么票证，政治上确实是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第一次普选以后，人民真正感觉到当家作主，经济上、政治上都翻了身。而且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也同时完成了，胜利地进行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但是，到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搞“大跃进”，高积累、高指标，就经受了一个大的折脊，遭受了一次挫折，遭受了三年经济困难，那个时候工业生产的水平大幅度的下降，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大大降低。以后又经过了调整，1961到1965年，调整以后，我们的工业又上升了，在这个期间，农业平均增长百分之九，工业增长百分之八点一，石油做到了完全自给，还清了对苏联的债务，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工业、农业、科学、文化教育各个方面发展都很快。所以，我们的人民怀念两个时期，一个1956年，是政治上经济上日子最好的时候，人民喜气洋洋的时候；一个是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的那一段，也是人人心情舒畅，经济繁